

跨域史學：

近代中國與 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 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黃賢強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 黃賢強
著. -- 一版. -- 臺北市：龍視界, 2015.03
冊：公分. -- (時間長河系列；VHC02)
ISBN 978-986-5620-01-1(平裝)

1. 華僑 2. 華僑史 3. 東南亞

577.238

104001869

VHC02 時間長河系列

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 研究的新視野

作 者／黃賢強

編 輯／傅達德

美術設計／菩薩蠻數位文化有限公司

封面設計／鄭 薇

發行人／蔡清淵

總編輯／王存立

版權策劃／李 鋒

出 版／龍視界

策 劃／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

106臺北市信義路四段98號12樓之2

電話／+886-2-27043265 傳真／+886-2-27043275

法律顧問／毛國樑律師

印製發行／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76巷65號1樓

電話／+886-2-2796-3638 傳真／+886-2-2796-1377

<http://www.showwe.com.tw>

劃撥帳號／19563868 戶名／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讀者服務信箱／service@showwe.com.tw

網路訂購／秀威網路書店：<http://www.bodbooks.com.tw>

國家網路書店：<http://www.govbooks.com.tw>

圖書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寶橋路235巷6弄6號4樓

電話／+886-2-2917-8022 傳真／+886-2-2915-6275

定 價／NT\$ 380元

I S B N／978-986-5620-01-1 (平裝)

2015年3月BOD一版

本著作物經廈門墨客知識產權代理有限公司代理，由廈門大學出版社授權龍圖騰文化有限公司旗下龍視界品牌出版、發行中文繁體字版權。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如有缺頁、破損，請寄回更換）



目錄 CONTENTS

前言

上編

跨域抗爭運動

——中國近代史的新視野和新史觀

第一章	動物化文圖與近代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	015
一	前言	016
二	19 世紀後期的動物化文圖	018
三	20 世紀初期的動物化文圖	029
四	結論	040
第二章	1905 年的廣州社會文化	
	——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	043
一	前言	044
二	廣州的排外傳統和反美情緒	045
三	艾麗絲訪問廣州事件	048
四	《拒約報》與廣州的抗爭文宣	053
五	結論	061
第三章	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	
	——1905 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	063
一	前言	064
二	美國華人與近代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的形成	067

三	英屬新馬華人與近代中國：從抵制美貨運動到革命運動	074
四	澳洲華人與近代中國：保皇會與抗美運動的關係	081
五	抵制運動：海外華人與中國近代史	085
六	代結論：三個問題的反思	091

下編

跨域華人社會與政治 ——從中國到南洋

第四章	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	093
一	前言	094
二	華人近代史分期的依據標準	096
三	新馬華人近代史前段各期的特點	098
四	新馬華人近代史後段各期的特點	104
第五章	近三十年來新加坡的華人研究	111
一	緒言	112
二	新加坡的華人研究基地	114
三	學報的出版	118
四	叢書和紀念特刊	120
五	回顧與展望	124
第六章	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	127
一	前言	128
二	19世紀檳城華人社會的領導階層	128
三	檳城的客籍副領事	132
四	檳城華人社會第三股勢力集團的形成	140
五	結論	142

第七章	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	143
一	前言	144
二	移民社會的歷史背景和婦女南來的原因	146
三	檳城的紅燈區	149
四	娼妓問題與社會輿論	152
五	妓女與鴇母及嫖客的關係	155
六	妓女與私會黨及警察的關係	163
七	娼妓參與的慈善事業	168
八	結論	171
第八章	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	
	——以《檳城新報》之論述為中心	175
一	前言	176
二	議論文章的性質和數量的分析	177
三	女子教育問題	178
四	結論	187
第九章	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	
	——論日本刺客事件	189
一	前言	190
二	日本「刺客」南來的情報來源及海峽殖民地政府的認知	192
三	海峽殖民地政府為何很快地「抓放」日本刺客？	196
四	英國政府對革命派和改革派的看法	200
第十章	孫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團體及其互動模式	205
一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成立	206
二	檳城三大革命團體的關係	212
三	辛亥革命史中的檳城革命團體	215

第十一章	同德書報社與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221
一	前言	222
二	孫中山與同德書報社	224
三	同德書報社的領導層	228
四	同德書報社與紀念孫中山的活動	233
五	結論：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	244

第十二章	戰後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的勞工運動	249
一	前言：勞資關係之基本理論	250
二	戰後工運發展的三個階段	254
三	勞工運動的後現代論述：浪漫劇的角色解讀	269
四	結論	281

續編

跨域知識分子

——再發現南洋與中國

第十三章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	283
一	前言	284
二	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	284
三	晚清招攬人才政策和南洋知識分子回國的機緣	291
四	餘論	299

參考書目	301
後記	318

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 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

黃賢強 著

前言 PREFACE

這本書可以說是我過去十餘年學術研究歷程的寫照：從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工作者，因為工作場域和研究資料等因素，而逐漸進入海外華人史和南洋華人族群社會的研究領域；再因自我的學術反思，近年又朝向南洋華人與近代中國的互動關係，尤其是南洋華人對近代中國影響的研究方向努力。

20 世紀 90 年代初我到美國進修博士學位，專業領域是中國近代史。1995 年取得博士學位，論文題目是有關於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與中國城市的群眾抗爭。我的論文強調，雖然學界普遍認為近代中國的群眾運動始於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但具有「近代」意義的群眾運動在 20 世紀初年已經發生，而 1905 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是其雛形。取得博士學位後不久，我受聘到新加坡國立大學任教。之所以被聘用，除了我在中國近代史專業領域的研究能力受到肯定外，也可能由於我的博士論文中有一章專門討論海外華人在抵制美貨運動中的角色。因為當時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更名副其實的系名為漢學系或中華文史學系）正積極發展有關海外華人研究的領域，而我的加入正可以加強這個領域的師資陣容。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教學的最初幾年，我繼續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因為那畢竟是我「寒窗苦讀」多年的專業領域。本書上編「跨域抗爭運動——中國近代史的新視野和新史觀」的三篇論文，即是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將研究課題在時空和視野上加以展開及對相關課題作更深入探究的結果。

第一章〈動物化文圖與近代中國的反教排外運動〉主要分析動物化語言和漫畫對中國近代群眾運動與民族主義運動的影響。過去對清末反教排外運動的研究，多著重於分析知識分子的反教思想和言論，即使有著作論及宣傳方式和內容，也多偏重於揭帖和公檄上

的文字，而忽略了圖畫的重要性。本章則追溯 19 世紀以來動物化諷刺文圖的發展，並討論哪些動物常被引用及為何被引用。更重要的是分析在什麼歷史環境下，不同的動物或同一類動物在不同時期的反教排外運動中，具有什麼不同的代表意義。

地方史的研究方法是第二章〈1905 年的廣州社會文化——從抵制美貨運動的幾個側面觀察〉的特點。中國地域遼闊，各地不只民情風俗有不同之處，政治文化也有所差異。此章論析 20 世紀初期廣州社會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廣州從 19 世紀中葉以來，由於鴉片戰爭的結果和影響，使廣州產生相當濃厚的排外氛圍，但另一方面廣州也很早就展露出其與時代接軌的「近代性」。此章不只從一些事例討論廣州人的排外情結，也特別從一份學術界較少注意的《反美禁工拒約報》的出版和內容來說明並分析廣州社會進行文明抵制的近代性意義。

事實上，我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同時，即已開始關注海外華人的研究。隨著研究的深入，我愈發瞭解到這兩個研究領域之間的相互影響。自從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以西方為中心的「挑戰—回應」史觀在 20 世紀 80 年代受到柯文（Paul A. Cohen）等學者的質疑後，西方學者開始努力以「中國中心史觀」來研究中國史。中國的史學工作者更發揮一貫的專長，即從中國的檔案和資料以及從中國人的史觀來論證史實，即使是涉及海外華人的有關課題也不例外。本書第三章〈近代中國與海外華人——1905 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就是要挑戰這種研究方法和史觀，強調在涉及海外華人的史事和研究問題時，應該也要引用「海外華人史料」並加入「海外華人史觀」，以便更全面和客觀地瞭解歷史問題，免得輕易落入民族主義的大論述中，認為海外華人參加任何與近代中國有關的活動，都是受到民族主義的

感召和影響。此章以在美國、南洋和澳大利亞的抵制美貨運動為例，證明各地海外華人積極參與抵制運動，其動機和方式都和中國境內的情況不可一概而論。在中國境外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優勢，除了就地利之便得以補充海外的研究資料外，也易於從發現到的新證據中得以超脫固有的史觀，讓學術觀點能夠互相交流和衝擊，迸發出更燦爛的火花。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不只是本區域的漢學研究重鎮，更是海外華人和東南亞華人的研究基地和中心。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研究東南亞華人或南洋華人課題的條件可說是得天獨厚。不僅大學圖書館藏有珍貴的文獻和檔案，以及早期的海外華文報章，大學當局更是鼓勵和大力資助發展東南亞研究，使之成為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最大特色和焦點。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如果不旁及東南亞研究或南洋研究，實在是暴殄天物，或置身於寶山卻空手而歸。因此，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開始教學和研究生涯後不久，除了繼續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也進入另外一個研究領域，即海外華人史，尤其是南洋華人社會的研究。所謂「海外」，指的是中國以外的所有地區；「南洋」則是有特殊歷史含義的地理名詞。如果以地理疆域而言，約等於今天的東南亞（Southeast Asia）。由於「東南亞」這個地理名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因為盟軍劃分戰區之便，才正式被啟用，所以，當我們談到戰前東南亞地區的華人時，更符合當時的稱法應該是南洋華人。時下雖然流行所謂的「跨國主義」，但濫用跨國主義理論來研究南洋華人，或東南亞各國獨立前的華人社會，是不恰當的。研究歷史，首要是能置身於當時的歷史時空情境。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新加坡人往來於新加坡和馬來亞兩地非常方便，因為它們都是英國的殖民地，而非獨立的國家。新加坡華人越境到馬來亞，不會說是出國或到馬來亞「國」

去，而是說去「州府」。所謂州府，即四州府和五州府（即馬來聯邦和馬來屬邦，見本書第四章的介紹）。州府是地域概念，而非國家概念。再者，戰前中國人到南洋活動，是跨地域的活動，而非跨國活動。南洋是個地域名稱，而且是非常有歷史意義的地域名詞，而非國家名稱。

在英屬南洋中，最早被開發的是檳榔嶼（現稱檳城，為馬來西亞的一州）和新加坡兩地。英國人先後在 1786 年和 1819 年控制和開墾檳城和新加坡。兩地的華人人口日益增多，華人社群組織隨之形成。在英國殖民地政府的授意下，華人社會自成一套以華人領袖和社團領導為首的管理系統，在殖民地政府的監督下自行運作。在整個 19 世紀大部分時期，檳城和新加坡分別是馬來半島北方和南方的華人政治、文化、商業和社會活動中心。到了 19 世紀末期和 20 世紀上半葉，新加坡才躍居為整個南洋地區的總樞紐。因為新加坡地處南洋中心，交通方便，是中國南來移民的登陸地和轉運站，因此新加坡華人的的人數眾多且集中，商業發達，使之成為南洋華人的商貿、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

本書下編「跨域華人社會與政治——從中國到南洋」所收錄的九篇論文，主要集中討論檳城和新加坡兩地的華人社會以及中國對當地政治文化的影響。有關檳城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研究，甚至是整體的新馬（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華人研究，已有不少專著和專題研究。但是，令人驚訝的是，至今尚無有關新馬華人歷史分期的討論。如果與中國近代史分期問題曾在過去一段時期的熱烈討論相比較，真是天壤之別。第四章〈新馬華人近代史分期芻議〉即對新馬華人近代史的分期問題提出看法，為新馬華人史的各種問題的討論立下基本的時間架構。第五章〈近三十年來新加坡的華人研究〉則是有關新馬華人史學史的回顧和展望。

近代新馬華人史始於檳城的開埠。1786 年英國取得檳城的經營和管理權後，開始引進大量移民協助開發經濟資源，其中主要包括中國東南沿海閩、粵兩省的華民。所以，檳城華人社會長期以來，便以閩南人（當地人泛稱為福建人）和廣東人（廣義地包括廣府人、潮州人、客家人等）組成。華人社會的領導權一向由福幫和廣幫所把持。最明顯的指標是當地兩個華人最重要的組織，即 1800 年成立的廣福宮和 1880 年成立的平章會館，一向以來都是由福幫和廣幫均分領導權。但檳城華人社會除了福幫和廣幫勢力之外，有沒有第三股勢力？如果有的話，是由何族群（當地稱為方言群）所組成，如何組成？這些問題是第六章〈檳城華人社會領導階層的第三股勢力〉所要探討的焦點。

一個社會當然不是由上層領導人所單獨構成，我們要對一個社會有更全面的瞭解，也要探索下層和中層社會的情況。南洋華人社會的下層民眾，除了眾多的「豬仔」（契約勞工）和自由勞工外，還有一群為人矚目的「豬花」或娼妓。第七章〈檳城的娼妓與華人社會〉除了從社會生活史的視角論述檳城華籍妓女的生活空間和日常遭遇外，還特別討論她們的公益慈善活動，並由此重新評價她們的社會地位。南洋華人中層社會的骨幹則是一般的知識分子，他們多數從事教書工作或在報刊雜誌社擔任編輯和撰稿工作。由於他們掌握了社會的「話語權」，他們的言論也往往代表社會主流輿論。第八章〈檳城婦女問題與女子教育——以《檳城新報》之論述為中心〉呈現了檳城華人知識分子所關注的婦女問題的焦點和心態。

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和政治人物的跨域活動，把中國政局和南洋華人社會牽連起來。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從中國流亡到海外的人物如康有為和孫中山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將海外華人社會當作他們的「三個基地」，即流亡避難基地、籌措財資和人員基地，以及策

劃變革大計基地。近代中國大時代變革的鬥爭場域，由境內延伸到海外。不只滿清駐外官員、康有為和孫中山等人在進行著三角交叉的鬥智鬥法，英國殖民地政府和日本友人也被牽涉在中國的政治漩渦中。第九章〈康有為與孫中山在新加坡——論日本刺客事件〉回顧 1900 年發生在新加坡的一場戲劇性事件，探討到底康、孫共同的日本友人宮崎滔天等人來新加坡是要刺殺康有為？還是要來撮合康有為和孫中山？英國殖民地政府在整個事件中又扮演何種關鍵性的角色？這個中國近代史上的羅生門事件，有必要從英國人的資料和視角來進一步解讀。

孫中山在南洋各地的跨域活動促使海外華人民族主義的興起，這看法已是學術界的共識。第十章〈孫中山在檳城的革命團體及其互動模式〉是以檳城為個案研究，分析孫中山的支持者是如何具體地將孫中山的政治理念落實，如何組織三個革命團體和機關，並且分工合作和互相支援。孫氏「三位一體」的革命事業動員模式，成了孫中山在海外推行革命運動時慣用的策略，這種革命組織和宣傳模式在新加坡也如出一轍。第十一章〈同德書報社與孫中山精神在新加坡的傳承〉則探討孫中山在 1925 年逝世後，孫氏三位一體中的新加坡同德書報社，如何挑起重擔，肩負起在當地傳承孫中山精神的重要使命。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外在大環境的影響，新加坡的社會和政治面貌有了嶄新的發展。在世界各地的反西方殖民統治浪潮衝擊下，再加上戰後共產主義和左派勢力高漲，新加坡的社會也受到影響。第十二章〈戰後新加坡社會變遷中的勞工運動〉就是討論新加坡從殖民地過渡到 1959 年取得自治邦地位，再到 1965 年成為獨立國家的陣痛期間所發生的一連串社會和政治問題。由於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1963 年擴大為馬來西亞），新加坡也於 1965 年獨立，當地華人的身分認同有了明顯轉變，分別成為馬來亞華人（馬來西亞華人）和新

加坡華人。「南洋」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地理概念名稱也在這個時期逐漸不再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東南亞」。它是東南亞地區各個享有獨立政治主權的新興民族國家或多元民族國家的總稱。

如果說上編的三篇文章是我原來的學術專業領域的研究成果，下編的九篇文章就是我跨越學術領域後的研究論集。前者屬於中國近代史範疇，後者是南洋華僑華人史或新馬華人史範圍。這樣的研究歷程也帶給我不少困擾，因為儘管南洋華人的史事研究與中國近代史有密切的關係，但南洋華人研究的主體畢竟還是地方本位的研究，研究當地的社會和政治文化等，所要參考的檔案和史料，以及所要注意的學術論著和文獻，都和中國近代史領域的要求不同。橫跨這兩個學術領域的研究，就如同時開闢兩個戰場一樣，倍感吃力。讓我感觸特別深刻的是，參加歷次國際學術討論會的時候，發現出席中國近代史學術討論會的往往是一批熟悉的學界朋友，而參加華僑華人學術研討會的往往又是另一群學界朋友，這兩批學者甚少有機會在同一個學術討論會的平臺上交集，因為這兩批學界朋友的研究議題和關心的領域有明顯的不同。

上述的困惑促使我思考一個問題，有沒有任何學術課題可以讓我同時結合我所關心和感興趣的兩個領域，同時又能充分利用我在這個兩領域的知識和研究資源。幾年前終於發現了伍連德：一位在中國醫學界被尊稱為「近代中國醫學先驅」的人物。同樣一個人物，在新馬地區卻是以「海峽華人三傑」之一（三位最傑出的當地土生土長的華人之一）聞名。儘管如此，直到兩年前我在蘇州大學一場晚清國家與社會學術研討會上發表有關伍連德的論文前，中國近代史學界除了從事醫學史的工作者外，沒有多少人知道伍連德。而在新馬地區，他的名氣和事蹟也不如另外兩傑（曾擔任過廈門大學校長的林文慶和撰寫《新加坡華人百年史》的宋旺相）為人所熟

悉。事實上，這位生長在檳城，獲得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學位，曾在南洋和中國做過一番大事業的世界級「鼠疫鬥士」，在近代史上的地位應該要比現在所知的來得更重要。掌握了這個發現，我終於找到一位足以讓我進行跨域研究的人物：他是一個在南洋和西方奠定學術和事業基礎，卻成就更大的事業於中國的知識分子。

經由對伍連德的研究，我也對有類似身分背景，且在不同領域對近代中國做出不同方面貢獻的南洋人物開始注意和研究。比伍連德年長廿二歲的同鄉辜鴻銘和比伍年長七歲的印尼（當時稱為荷屬東印度）華僑李登輝也受到我的關注。辜鴻銘在檳城接受英語教育，在歐洲完成文學和哲學專業訓練，來到中國後，不只因為長期在張之洞幕府服務受人矚目，更因為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固執和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在中國近代文化史上留名。李登輝在新加坡接受英文教育，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回到中國後，為復旦大學的創辦和經營，立下汗馬功勞。伍連德、辜鴻銘和李登輝等南洋華人知識分子，當年為何來到對他們來說不只是環境陌生，而且也語言不甚通的國度。答案絕對不是老生常談中所謂的「愛國華僑回國貢獻和建設祖國」論述這麼簡單。探究南洋知識分子到中國的真正原因，正是第十三章〈南洋知識分子與晚清國家和社會——再發現辜鴻銘、李登輝和伍連德〉的核心問題。

第十三章也是本書續編「跨域知識分子——再發現南洋與中國」唯一的一篇文章。所謂再發現南洋與中國，表示我正努力尋回與南洋及近代中國有密切相關的歷史記憶或長期受冷落的史實和人事；所謂跨域知識分子，是指像伍連德、辜鴻銘、李登輝，還有林文慶等跨地域、跨專業領域的傑出人物；列為續編，表示在我完成上編和下編的研究歷程後，正繼續努力朝向一個嶄新的研究方向。第十三章不是結束章，而是我研究里程碑的另外一個起點。有關伍連德等南洋知識分

子的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還在進行中。

總的來說，這本書從研究對象的活動空間而言，無疑是跨地域或跨疆域的，它涉及中國、南洋和歐美等地。從研究方法的範疇而言，是跨學術領域的，除了傳統史學研究方法貫穿各章外，有些文章也輔以歷史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和查訪、社會學的統計和調查、政治學的勞資理論學說、口述歷史記錄、生活史、地方史和性別史等研究方法。既然本書是跨地域和跨領域的史學研究成果，乃定書名曰：跨域史學。而副題則強調此研究是以新的視野來探討近代中國和南洋華人社會的互動關係。